

族群同化與動員

台灣民衆政黨支持之分析*

王甫昌

本文主要的目的，在於運用族群動員的概念，為台灣反對運動和省籍族群議題的糾結，提出一個初步的解釋。本文指出，在過去國民黨透過動員戡亂體制而形成的省籍族群政治結構下，反對運動訴諸本省人的省籍不公平的意識而進行政治動員是很難避免的狀況。然而台灣過去四十年之中所達成的省籍族群同化，及族群在地理上的混合，也迫使反對運動只能採取「內隱式」的族群動員策略；而國民黨運用體制性的力量（如教育及大眾傳播），對於本省人所進行的單向教化式的族群同化的結果，更大幅地削弱了反對運動族群動員的有效性。本文運用「台灣地區社會變遷基本調查」的資料，以台灣民衆的政黨支持的經驗分析，來論證這些說法解釋力。由於外省籍民衆在政黨支持上幾乎都傾向國民黨，本文因此將分析焦點置於本省人的政黨支持之上。本文的經驗分析發現，本省人之中，族群同化程度較高（自認為中國人、國語流利、和外省人通婚）者較支持國民黨；相反的，族群同化程度較低（自認為是台灣人、族群內婚）者則比較支持民進黨。本文也發現，本省人的族群同化主要是源自於體制性的同化力量。

一、前言

在近代國家政治發展或轉型的過程中，族群往往扮演一個重要的角色。由二次大戰以後許多殖民地國家以民族主義的旗幟為號召，建立獨立的國家，到一九

本文於民國83年（1994）6月出版。

作者任職於中央研究院民族學研究所。

* 本文初稿曾以「族群融合與族群動員——民進黨支持基礎之分析」為題，宣讀於中央研究院民族學研究所小型研討會「民主化與政黨競爭——何以國民黨繼續執政？」中，1993年6月12日。本文對於初稿作了重大修改，分析的資料也不相同。文中使用的資料是由行政院國家科學委員會所支持的「台灣地區社會意向調查」八十年第二次專題調查：第二屆國代選舉（NSC 80-0301-H-001-46-B1），及「台灣地區社會變遷基本調查」第二期第三次（NSC 81-0301-H-001-504-B1），謹此致謝。吳乃德對本文提出了一些寶貴的建議。另外，作者要特別感謝《中央研究院民族學研究所集刊》兩位匿名評審的評審意見及修改建議。

七〇年代以後，許多高度工業化的國家中地域性的族群團體以族群動員來追求較大的政治權力或甚至政治上的獨立，諸多事例已使得大多數人都不得不正視族群在現代政治中所具有的舉足輕重的地位。對於這樣的歷史轉變，社會科學的研究者也逐漸意識到過去的學者將族群現象視為一種非理性、傳統的、或特殊主義性 (particularism) 的社會組織原理，是一個在工業化、理性化、及現代化的發展過程中，首先被破壞的對象的想法是不正確的。族群被視為是現代國家中，除了階級以外的一個重要社會分歧 (social cleavages)，在某些狀況下，其重要性甚至高於階級。因此，對於族群在現代社會中所扮演的角色的解釋上，相當重要的一個議題是：在什麼狀況下族群將成爲一個重要的社會分歧？

在台灣反對運動發展的過程中，圍繞著省籍而衍生的族群議題一直是一個糾纏不清的問題。這些糾結可以由下面的事實來加以觀察。首先，由不同省籍族群對於反對運動的支持來看的話，歷年來的各項選舉中，外省人投票支持黨外或民進黨候選人的比例始終未超過百分之五，一般都在百分之二以下。換言之，雖然並不是所有的本省人都支持反對運動，但是反對運動的支持者百分之九十五以上都是本省人 (吳乃德 1993；王振寰 1989；林佳龍 1989；Chang 1989)。其次，由反對運動的意識形態或其挑戰的議題來看，它也和族群有相當的關聯。雖然由於執政的國民黨容忍的尺度不同，而使得反對運動在不同的階段有不同的主要挑戰議題 (最早的「住民自決」到「台灣獨立」及 1992 年立委選舉時的「一中一台」)，但是這些都是對於國家認同或是國家基本體制的挑戰。在 1992 年二屆立委的選舉中，國民黨及民進黨更不約而同的將他們對統獨及國家認同問題的立場，列爲黨提名的候選人共同政見的第一條。因此我們似乎可以說，國家認同的問題是目前朝野的主要爭議所在；而國家認同又是族群政治中的核心議題。族群的議題和台灣近年來的政治發展之間的糾結由此可見一斑。

然而，不論是國民黨或民進黨都一致的否認自己的族群色彩，甚至對公開談論族群者加以譴責，或以此相互指責。早在民進黨成立後不久，當時的民進黨發言人尤清在答覆外國記者時，就曾公開表示民進黨絕非狹義的台灣人運動 (《民眾日報》1986 年 12 月 8 日)。在 1990 年國民黨的政爭中，省籍情結正式浮上台面，但是指責別人挑起省籍情結卻成爲詆毀政敵的最有效的武器，以省籍爲基礎的族群動員成爲人人避之惟恐不及的標籤。這都說明了在目前的台灣族群和政治的糾

結之間有強烈的價值判斷的色彩。

本文的主要目的，在於對台灣近年來的政治發展和（省籍）族群之間的關係做初步的釐清。對於這樣龐大的一個議題，作者在本文中希望達成的目標是相當有限的——本文將試圖去分析族群同化和族群動員之間的關係，以作為理解台灣族群政治的切入點。為了進行這樣的分析，本文將先在概念上做一些澄清，特別是「族群動員」的概念為何及如何可用於理解目前台灣政治動員（尤其是反對運動）的過程。本文將指出台灣的族群政治結構有利於反對運動採用族群動員的策略，但是台灣的族群社會結構同時也限制這樣的族群動員表現的形式及其有效的範圍。所謂的「族群社會結構」則包括族群之間的同化及族群在地理空間上的分配狀態等因素。其次，本文將採用社會變遷調查的資料來分析族群同化和支持國民黨或反對運動之間的關係。本文將嘗試去評估關於族群同化和族群動員之間關係的兩種說法——競爭論及隔離論（或反應族群論）對台灣民眾政黨支持的解釋力。

二、「族群動員」概念的檢討

對於二十世紀中族群和政治發展之間的關係，比較引起研究者興趣的，是亞非兩洲的人民在二次大戰後由民族主義所推動，而起來反抗帝國主義的殖民者以追求政治獨立的革命（例如，Emerson 1960）。民族主義（或作民族國家主義，nationalism）是一套關於國家或民族之範圍為何及應如何組成的看法；作為一個意識形態的運動，其目的在於「達到及維持一個真正的或潛在的民族在政治上的自治及獨立」（Smith 1971:171）。民族主義因為在冰冷的理性利益（政治的或經濟的）以外加入熱烈的民族情操，因此經常成為政治動員及政治發展的有效推力（Gellner 1969；Bell 1975）。就本質上來說，民族主義因為同時具有理性及情操的特質，而打破了過去對於社會變遷中社會組織原理上「傳統／現代」兩元對立的看法（Ragin and Davies 1981），它對於解釋族群這樣的與生俱來的情操在現代社會中持續存在自有其顯著的貢獻。不過，民族主義的概念由於和十八世紀歐洲國家發展的經驗，及一九五〇年代第三世界被殖民國家爭取獨立的革命運動的歷史狀況太過重疊，因此較不能涵蓋族群政治中的其他形式及層面，晚近的學者

因此漸漸採用「族群動員」的概念來作為分析族群與政治之間的關係的工具（例如，Olzak 1983）。

Olzak 將族群動員 (ethnic mobilization) 定義為：「特定團體以某種族群認同的特徵(例如膚色、語言、或習俗)組織起來追求集體目標的過程」(1983:355)。這個概念的使用，將族群性在現代社會中的持續或崛起與集體行動的密切關聯做了更清楚的宣示(見 Nielsen 1985)。由上述的定義來看，任何團體以族群的特徵作為動員的方式，而追求和族群有關的集體目標，都算是族群動員。這是一個比較寬廣的定義，因為它可以包含相當多類型的族群集體行動，而不止是前述追求國族自治獨立的民族主義而已。首先，該定義中所謂和族群有關的集體目標可以是對於國家或民族範疇及認同的重新界定（也就是對於體制的變革，這是一般的民族主義所欲達成的目標），但它也可以是變革程度較小的體制內族群政治規範的協商。由集體行動的觀點來看，和族群有關的集體目標是指以族群身份（不論是真實的或想像的）為界線的公共財。

族群動員的另一個特徵：「以族群的特徵作為動員的方式」，就概念上來說也可以容納各種族群色彩明顯程度不同的政治動員策略。一般談到族群動員時，大多數的狀況下想到的是以明白的族群認同、族群利益為訴求的政治動員；例如英國的威爾斯、加拿大奎北克省、或比利時的 Flemish 的族群運動等皆是 (Belanger and Pinard 1991; Nielsen 1980; Olzak 1982; Ragin 1979)。這些國家的族群運動都出現了色彩鮮明的族群政黨，以地區性的族群之利益為號召，爭取較大的政治權力或甚至自治。然而，這並不是族群動員唯一的動員形式。這樣的動員形式有其發生的特殊的社會背景，也就是進行動員的族群有其領土上的基礎，亦即和其他族群在地理上有所區隔。在這些例子中，被動員的族群和其所對抗的其他族群各自有不同的生活地域，只是同屬一個政治或經濟體系。在這種狀況下，族群的差異往往和地域或經濟的差異重疊，族群成員之間利益同質性較高，族群色彩鮮明的政治訴求將是有效的動員策略。

反之，如果對抗的族群之間沒有前述的地理隔離，或是過去的地理隔離逐漸在瓦解，結構上的接觸機會所導致的族群同化可能會使旗幟鮮明的族群訴求（「外顯式」的族群動員）較不被接受，而必須以民主或其他的名義來進行政治動員。因此，一個政治實體中權力分配方式對於特定族群不利的狀況，雖然將使弱勢族

群較傾向於以族群動員的方式來爭取權力，但是這樣的政治結構並不一定保證他們會採取旗幟鮮明的族群動員策略。是否採取旗幟鮮明的族群動員需視族群的社會結構而定。將族群的訴求隱藏在對於政治體系民主化的要求之中是一個經常被採用的「內隱式」的族群動員策略。不過在這種狀況下，由於族群政治結構的不平等，民主化的要求常意味著改變族群政治權力的分配方式或規則。

換言之，本文認為族群動員是可以藉不同的形式發生或進行的。「外顯式」的族群動員策略是直接訴諸動員對象的族群情操，來追求排外性的族群集體目標；「內隱式」的族群動員策略則是透過對於政治安排原則的民主化之要求，來改變族群的集體不利地位。在內隱式的族群動員策略下，雖然運動者並不是以族群身份為直接訴求的對象，但是由於民主化的要求將因為改變權力分配方式，而威脅到優勢族群既有的集體利益。在這種狀況下，優勢族群將很難分辨弱勢族群民主化的要求，究竟只是體制內的改革，還是對其體制合法性的根本挑戰，因此這種挑戰不易得到優勢族群成員的支持（Smelser 1962；Beach 1977）。尤其是當弱勢族群在人口比例上居於優勢時，其族群運動的支持者仍將是以弱勢族群成員為主。例如，很多美國白人支持一九六〇年代的黑人的民權（甚至民族）運動，但是較少南非的白人支持其國內黑人民權運動；前者黑人的比例約為 12%，而後者則為 85%。因此，族群的人口比例、族群在社會或地理空間上的分布、及族群之間關係的形態，都是影響族群動員採取內隱式或外顯式的策略的重要因素。

三、台灣反對運動的族群動員

由上面對於族群動員概念的討論來看，一九七〇年代中葉以後的台灣反對運動也可以說是台灣人的族群運動。雖然反對運動的領導階層中有不少人曾公開否認台灣的反對運動是台灣人的民族運動（例如前面提到的尤清），而強調反對運動純粹是一個民主運動；但是也有學者注意到台灣反對運動中的台灣人民族主義色彩（若林正文 1988；張茂桂 1993；吳乃德 1993）。基於下面的理由，作者認為台灣的反對運動可以由民族主義的族群動員來加以分析。

首先，就反對運動的目標來看，雖然其階段性的目標一直在改變，但是其最終的目標一直是追求台灣政治的民主化及本土化。即使是《大學雜誌》在 1971 年

台灣被迫退出聯合國後所作的國是建言中，中央民意代表的全面改選一直就是政治異議者在民主化挑戰上的主要訴求之一（《大學雜誌》1971）。到 1979 年《美麗島雜誌》創刊後，國會全面改選更成爲重要的議題。在民主的抽象理念下，台灣的反對運動挑戰的主要政治現實是隱藏在國民黨一黨獨大背後的族群政治結構的不平等。關於國民黨在台灣威權統治如何在大陸撤退之後建立，過去已有相當多的研究，本文不在此贅述。不過，本文有必要指出這個威權統治結構的族群政治意涵。爲了維持在台灣統治的合法性，國民黨以動員戡亂時期的名義，凍結了中央級的民意代表的改選達四十年以上；在蔣經國於一九七〇年代中期實施啓用本省籍政治人物的本土化政策之前，本省人對於政治權力的參與多被限定於地方層次，權力核心中的少數本省人只具有象徵的意義。其結果造成本省人不但在實際的政治權力分配上處於劣勢，連參與的管道都在動員戡亂時期的政治架構安排下被窄化、降低到相當於一個省的層次⁽¹⁾。吳乃德以精英兩元主義（elitist dualism）來描述這種政治權力上的族群區隔（Wu 1987）。對於人口比例上居於多數的本省人而言，這樣的政治結構是相當容易以族群政治的語彙詮釋爲具有族群歧視意味的安排。對於這樣的政治結構所作的民主化挑戰，也就不可避免的會對現有族群政治權力分配的規則造成直接的衝擊。

然而，不平等的族群政治結構並不一定被劣勢族群詮釋爲不公平，也不必然就一定導致劣勢族群的集體反抗。因爲不平等的政治權力結構可能被主導的意識形態合理化，而不一定被詮釋爲不公平。同樣的，即使現有的政治權力的安排被詮釋爲不公平，一般人仍可能因爲過去被鎮壓的經驗，而認爲它是很難、或甚至不能被改變的。對於嘗試想改變或挑戰這樣的政治結構的反對運動而言，其最大的挑戰正在於如何將「現有體制不公平、它應該被改變、也可以被改變」⁽²⁾的意識形態推廣出去，並運用這樣的意識形態來組織一個有效挑戰力量。用社會運動的詞彙來說，前者所指的是對於劣勢族群成員之間錯誤意識的「認知解放」（cognitive liberation），或是「共識動員」（McAdam 1982；Klandermans

(1) 這是就其分配的精神來說的，當然在台灣實際政治的安排上，即使在 1991 年國會全面改選之前，本省人所擁有的政治權力早就已超過所謂的三十六省中的一省的比例。不過，國民黨對於台灣政治的安排的基本理念仍是以大中國爲架構；給予本省人多於一省應有比例的政治權力，是基於動員戡亂時期「暫時遷台」的一個權宜措施，它始終沒有放棄對中國大陸主權的宣稱。

(2) 這是借用 Piven and Cloward (1979) 的話。

1984)；後者則是所謂的「行動動員」。

就意識形態的挑戰來說，台灣的反對運動提出了台灣意識用以對抗國民黨的大中國意識。所謂的「大中國意識」，按黃光國的說法，是指下列三個關於國家、民族、及政治結構安排的基本認知元素：「台灣人就是中國人」、「台灣是中國的一部分」、及「台灣必須維持足以代表全中國的政治結構」（黃光國 1987⁽³⁾）。台灣人的大中國意識是國民黨在台灣能夠維持其政權合法性的一個重要基礎，它是國民黨來到台灣後透過強勢的教化及宣傳，逐漸讓民眾接受的一套關於國家及民族範疇的看法。它的一個重要功能，正在於合理化國民黨在台灣統治地位；而其附帶的功能，則是形成及維持外省人在政治權力上的優勢。相反的，反對運動由早期的鄉土意識（1979年的鄉土文學論戰）、到後來台灣結（1983年左右）、台灣意識的提出及內部的辯論，都是針對中國意識所發展的對抗性的意識形態（參見《中國論壇》1987；施敏輝編 1988）。黃光國認為最極端的台灣意識即是所謂的「台獨意識」⁽⁴⁾，它包括三個和前述（保守）中國意識針鋒相對的元素：「台灣人不是中國人」、「台灣不是中國的一部分」、「政治革命（以達到台灣獨立）」（黃光國 1987：3）。台灣意識的一個重要的政治意涵，可以說是對於台灣的民族、國家做不同於國民黨主導意識形態的重新界定。正如所有的民族主義一般，它訴諸近百年來的台灣歷史來詮釋現有政治結構的不公平，及它對所謂「台灣民族」的壓迫，並提出一個新的民族國家的範疇。台灣意識因此是反對運動動員的主要訴求手段之一（陳樹鴻 1983）。

台灣意識除了有國家認同的政治意涵之外，也有文化層面的意義。反對運動早期就相當強調對本土語言的重視，自從群眾運動的策略在 1985 年左右成為當時反對運動發展的重要策略開始，語言使用的問題就一直頗受注意。在反對運動群眾活動的場合中，所使用的語言大多數的時候都不只是選擇溝通媒介的問題而已。在台灣意識的詮釋架構下，國語被視為中國意識教化中的一個環節，而台語則具

(3) 黃光國在他的論文中其實區分了兩種不同的中國意識：保守中國意識，及民主中國意識。二者在「台灣人是中國人」及「台灣是中國的一部分」兩點的看法上是一致的。不同的是，保守中國意識認為台灣必須維持足以代表全中國的政治結構；而民主中國意識則主張應建立民主政治結構（見黃光國 1987:2）。本文中所引用者，為黃文中所謂的保守中國意識。

(4) 黃光國認為台灣意識根據其反體制的程度之不同可以分為三類：台獨意識（程度最強）、現實意識（居中）、及鄉土意識（程度最弱），（黃光國 1987:2-3）。

有「被壓抑的母語」的地位，使用台語來訴諸群眾的族群情操，往往有相當好的動員效果。而過去台語文化中豐富的遺產，例如歌謠、俚語、及典故，更為群眾活動在散佈、凝聚、及加強台灣意識上提供了有利的素材。

不過，這裡必須指出的是，以台語作為反對運動動員的手段並非全然出於反對運動領導者的主動策略設計，更不是領導者之間的共識。它是反對運動領導者與群眾之間在群眾活動的場合中，長時間互動所產生的結果。事實上，部分反對運動領導者為了沖淡反對運動的族群色彩及其可能帶來的族群排外效果，還在早期群眾活動的場合中刻意使用國語進行演講，例如民進黨的前任秘書長張俊宏⁽⁵⁾。在多數的狀況下，群眾對於國語的反應通常比較冷淡、或甚至以叫囂來表現不滿。到後來部分最初堅持使用國語的反對運動領導人為了維持既有的支持，只有屈服在群眾的壓力下，而台語也逐漸成為反對運動群眾活動時所使用的主要語言。

由以上可知，台灣反對運動用以動員支持的方式也和族群的特徵有直接的關聯。在共識的動員上，反對運動用來吸引支持者以對抗國民黨的台灣民族主義的意識形態，雖然不是明白的以族群為號召，但是卻和省籍的族群分歧有相當程度的重疊。這尤其表現在反對運動的領導者及支持者的族群組成之上。台灣反對運動領導者之中的外省人由早期「自由中國」雜誌時代以外省人居於多數的狀況，到民進黨成立之後幾個重要的外省籍的核心領導人，陸續和民進黨因為在統獨的意識形態上不合而絕裂(例如費希平和林正杰)，外省人在民進黨領導階層的比例是相當低的(見 Wang 1989:192-194)。一直到 1992 年 8 月 23 日「〔外省人〕台灣獨立協進會」成立，反對運動才有較顯著的外省人支持。而就反對運動一般的支持者而言，其省籍的區隔就更加明顯了。正如本文一開始就提到的，過去所作

(5) 關於反對運動群眾活動中語言的問題，可以由《民眾日報》及《自立晚報》關於 1987 年黃信介及張俊宏出獄後，所辦的一系列的「重返美麗島大會」群眾活動的報導見其一端。《自立晚報》的報導對於張俊宏堅持使用北京話(國語)演講的作法，曾經特別加以注意。例如，在第一場演講會於屏東市舉行時，記者如是報導：「張俊宏昨晚以帶有捲舌音的標準國語發表演講……」(《自立晚報》1987 年 8 月 9 日)。第二場在高雄縣的演講中，「張俊宏昨晚首次改用『台灣話』宣揚其所主張的『台灣是世界島』等政治理念……」(《自立晚報》1987 年 8 月 12 日)。到了第六場在台北縣中和市的演講時，「張俊宏說，大家應該培養寬闊的胸襟，不要一味地排斥北京話，因為語言是一項資產，但他反對壓制，消滅語言的政策。」(《自立晚報》1987 年 8 月 16 日)。語言問題似乎一直是張俊宏的演講中潛在或明顯的議題。而《自立晚報》的記者一再地報導此一議題，似乎可以看出語言問題和反對運動的糾結。另外，《民眾日報》1987 年 4 月 25 日也登出一篇提到反對運動的群眾活動中「泛閩南語主義」的色彩的觀察(愚庵〈令人擔心的群眾運動〉，二版)。

的諸多調查都顯示，外省人之中支持反對運動（特別是民進黨）的比例都十分低。

爲什麼外省人不支持反對運動？吳乃德最近的一篇論文指出，對民進黨的支持的兩個重要因素是國家認同（支持台灣獨立）及民主信念（吳乃德 1993a）。如果我們接受這個結論的話，則上述的問題可以轉變爲：爲什麼外省人不支持台灣獨立？以及，爲什麼外省人的民主信念比較低⁽⁶⁾？這兩個似乎是相互獨立的問題，可以從台灣族群政治的現實中得到一個共同的解釋。國民黨對於反對運動的攻擊使得多數的外省人相信「完全的民主只是台灣人奪權的藉口」，而由於外省人在台灣人口中所佔的比例不到 14%，對於在完全民主下被人口多數的本省人統治的恐懼，使得多數的外省人即使認爲國民黨的威權統治是不對的，也不願意支持台灣政治上完全民主化（劉一德 1991）。至於台灣獨立的議題，由於牽涉到外省人情感上的集體認同的象徵，及新國家建立後其族群尊嚴可能喪失（張茂桂 1993），再加上國民黨以台獨將引來中共的武力犯台，及台獨成功的話外省人將無立足之地作爲宣傳（見胡台麗 1990:127，所記錄的一位外省榮民的說法，及《遠見雜誌》1987:24，一位意見領袖的發言），在 1992 年以前幾乎沒有什麼外省人支持台灣獨立。吳乃德以 1991 年二屆國民大會代表選舉時，社會意向調查所作的專題調查的資料進行的分析，就發現有將近八成的外省受訪民眾贊成中國統一，而只有不到兩成的外省受訪民眾贊成台灣獨立（吳乃德 1993b:48）。由於外省人基於政治現實的因素而不支持完全的民主化及台灣獨立，因此對於民進黨的支持相當有限。至於外省人在該次選舉中的政黨支持，本文根據同一份資料，將受訪者在該次選舉中投票支持的政黨按受訪者的族群身份區分如表 1。

根據表 1，我們可以發現，外省人之中支持民進黨候選人的比例只有 2.5%，尙不及外省選民支持其他黨派候選人的 4.4%。在該次選舉中，民進黨的支持者有 97% 以上是本省人。必須指出的是，該次選舉前，因爲民進黨將台灣獨立的條款放入黨綱，國民黨發動文宣全力攻擊。在當時輿論對台獨主張抱持強烈不贊成的氣氛下，社會意向調查受訪者所表現的對提出台獨主張的民進黨之支持，遠較實際得票率爲低。根據選後的統計，該次選舉中國民黨實際得票率是 71%，民進黨得票率則爲 24%；而社會意向調查的得票率，國民黨是將近 68%，民進黨是將近

(6) 按照吳乃德論文中的發現，第二個問題比較精確的問法應是：「在控制了教育及年齡之後，爲什麼外省人的民主信念比較低？」

表 1 受訪者的族群身份與二屆國代選舉時所投政黨的交叉表

單位：個人

	國民黨	民進黨	其他黨派	不記得	拒答	合計
閩南人	641 (62.2) [70.2]	159 (15.4) [93.0]	76 (7.4) [80.9]	83 (8.1) [94.3]	71 (6.9) [86.6]	1030 [76.4]
客家人	132 (82.5) [14.5]	8 (5.0) [4.7]	11 (6.9) [11.7]	2 (1.3) [2.3]	7 (4.4) [8.5]	160 [11.9]
外省人	140 (88.6) [15.3]	4 (2.5) [2.3]	7 (4.4) [7.4]	3 (1.9) [3.4]	4 (2.5) [4.9]	158 [11.7]
合計	913 (67.7)	171 (12.7)	94 (7.0)	88 (6.5)	82 (6.1)	1348

表 註：(1) Chi-Squares=68.928; DF=8; p<.0001。

(2) 括弧()內為橫行百分比；[]內為直列百分比。

資料來源：社會意向調查二屆國代選舉專題研究，1991年12月，中央研究院中山人文社會科學研究。

13%。國民黨的得票率在二者之間只相差 3%，而民進黨的得票率在兩者之間則相差在 10%以上，顯示一般投票支持民進黨的人，較不願意公開表明自己的政治立場，特別是在採用面訪的調查訪問中。由表 1 也可知，閩南人之中，表示不記得投給誰及拒答的比例高達 15%，我們應可以推斷這其中有相當大的比例是投給民進黨的候選人的。反之，外省受訪者中表示不記得投給誰及拒答的比例僅佔 4.4%，因此，絕大多數的外省人在二屆國代選舉中不支持民進黨的事實應是可以確定的。由外省人支持其他黨派候選人的比例尚且高過對於民進黨的支持的事實來看，當時外省人似乎有寧可投給其他政黨也不願意支持民進黨的傾向。由於外省人支持民進黨的比例太小，我們無法直接分析外省人為何不支持民進黨；不過，由上述的分析似乎可以說反對運動的台灣民族主義的色彩，以及國民黨對此一意識形態的攻擊，是使外省人不支持反對運動的重要原因。

以上分別由反對運動的目標、動員方式、及領導階層與支持基礎，來說明台灣的反對運動雖然並未以明白的族群訴求作為動員的手段，但仍然是帶有民族主義色彩（台灣意識）的族群動員。由上面的討論中，我們也發現，外省人對民進黨的支持到 1992 年為止，幾乎是常數而非變數。而常數是無法被解釋的。因此，我們可以將對於台灣反對運動、或者一般性的政黨支持的解釋問題簡化為：「本省人之中，誰支持國民黨？誰支持反對運動？為什麼？」。

對於這樣的問題可以有很多種回答的方式及答案，本文只希望由族群關係的觀點提出一個可能的部分解釋。在這一點上，西方關於族群動員的幾種理論可能有助於我們思考這個問題。

前面的分析中，可以歸結出來的一個關於台灣反對運動的意涵的論述：它是一個以散佈台灣意識來對抗中國意識的共識動員為手段，而希望改變台灣政治結構的運動。這裡必須先回答一個問題：中國意識及台灣意識是怎麼產生的？由鉅視（團體）的層次來看，中國意識的產生和國民政府遷台後所面臨的挑戰有關。居於統治地位的國民黨在撤退到台灣來之後，在面臨一個仍有敵意、文化上相異、人數上又居於優勢的本土社會的狀況下，為了鞏固政權的合法性，而開始建構一套用於合理化其權力安排的意識形態，可以說是中國意識的來源（參見王甫昌 1990, 1993a）。國民黨以其所能控制的社會制度及資源，例如教育機構、大眾傳播、及文化事業，強力灌輸台灣民眾中國意識⁽⁷⁾。相反的，台灣反對運動在挑戰國民黨的過程中，逐漸由訴諸台灣的族群歷史經驗，建構出一套反對國民黨一黨獨大的意識形態，則是台灣意識的來源。

如果我們將分析的層次由鉅視降到微視（個人），則上述問題的答案就不一樣了。本省人的中國意識基本上是學習主導意識形態的結果，由族群融合的觀點來看，這意味著本省人認同及文化上的同化。影響到上述兩個同化層面的原因，也因此是影響本省人中國意識的因素。本省人的台灣意識又是怎麼來的？祖先就已住在台灣、會講台灣話等事實並不就讓一個人產生台灣意識。同樣的，個人即使有被壓迫的親身經驗、或對現有體制中權力的安排極端的不滿，也不一定就保證他（她）有台灣意識；這些經驗及不滿只是使他（她）較可能接受一個具有反抗

(7) 關於教育如何及為何成為中國意識的傳輸制度，請參見陳伯璋（1988）及石計生等人（1993）的分析。

色彩的意識形態，因為意識形態的產生是一個集體的社會建構過程。作為和官方意識形態相抗衡的一個異議性的意識形態，個人台灣意識的產生，可以說主要是意識形態被轉化的過程，也就是接受了一套異議性的集體意識。那麼，是什麼因素使一個人較易接受這樣的意識形態呢？下面本文將從族群動員的分析角度，提出一些對立性的解釋。

四、族群同化與族群動員

過去西方的文獻中關於族群動員的解釋有幾種不同的說法，較為重要的有發展論、反應族群論、及競爭論(參見 Olzak 1983, 1985; Nielsen 1985)。其中「發展論」(developmentalist theories)認為族群動員是一個發展較落後的地域性族群，用以抗拒發展較快的地區的民族主義之擴張而產生的結果；它預測當這個落後地區開始發展時，族群動員的功能便將消失(Lipset and Rokkan 1967)。由於發展論的預測和大多數現代化的國家中族群仍然持續存在的現象並不一致，因此已較少被接受。後面兩個理論都認為現代化或所謂工業化、都市化的過程，非但不能如早期的社會學家所認為的將造成族群性的消失，它反而將使族群性成為現代社會中持續而重要的社會分歧。不過二者所提到的導致族群持續的社會過程卻不太相同。簡單的說，「反應族群論」(reactive ethnicity model)者認為，一個社會的經濟開始發展後，地區間發展程度不均往往和族群的界線相重疊；在這種狀況下，經濟上劣勢族群和優勢族群在文化上及地理上的區隔，將有助於劣勢族群進行族群動員(Gellner 1969; Hechter 1975)，因此族群之間的社會區隔是有利於現代社會中族群動員的條件。相反的，「競爭論」(competition model)者卻認為，如果不同的族群各自有自己區隔的社會空間，即使族群之間有不平等存在，他們仍可能相安無事，而不會有族群動員；唯有在先前族群的界線及區隔逐漸衰退，而不同族群的成員開始在相同的勞力市場中競爭、或開始競爭相同的資源時，族群內的凝聚力才會因為族群性的策略運用而增加(Barth 1969; Hannan 1979; Olzak and Nagel 1986)。反應族群論及競爭論對於族群之間的同化在族群動員的過程中，所扮演的角色似乎有不同的看法。為此，我們必須先解釋一下族群同化的意義。

所謂的「族群同化」(ethnic assimilation)，可以界定為兩個或兩個以上的族群在接觸之後，逐漸淡化原有族群界線的過程。Milton Gordon 認為同化可分為下列七種類型或過程（參見 Gordon 1964:71）：

- (1)文化同化——改變自己的文化類型接受其他族群的文化；
- (2)結構同化——族群之間開始在初級團體的層次上交往；
- (3)婚姻同化——族群之間有大規模的通婚；
- (4)認同同化——不同的族群開始發展一種共同的我群感覺；
- (5)態度接受的同化——不再有族群偏見的態度；
- (6)行為接受的同化——不再有族群歧視的行為；
- (7)公民的同化——族群之間沒有價值或權力的衝突。

這七類的同化包括了族群接觸後，促成族群關係產生變化的若干重要面向。在 Gordon 的描述中，上述七種同化在發生的時序上是有步驟的，而結構同化則是其中的關鍵，結構同化與否或其程度決定了一個社會或國家中族群關係的類型。Gordon 認為，一旦結構同化達成，其他類型的同化也就水到渠成自然地跟著發生。不過，族群同化的現象並不如 Gordon 所描述的如此具有明確的步驟性，或直線化。作者最近的一篇論文就發現，省籍族群在婚姻上的同化，對於外省人的認同及公民的同化並沒有顯著的影響(王甫昌 1994b)。同樣的，族群間在文化及結構上的同化，並不必然造成公民的同化。在另一篇論文中，作者根據對隱藏在族群同化的理論背後的功能論假設之檢討，而提出一個衝突論的族群同化觀，說明如果文化或認同的同化不是立基於平等地位的雙向融合過程，而是以合理化優勢者統治地位，或合理化現有權力結構為目的的單向教化過程，則上述同化可能反將導致族群之間的（權力）衝突（王甫昌 1993）。如果用這些同化的概念及類型來重新建構上述的兩個族群動員的理論的話，則可以說：族群同化和族群動員之間並不存有簡單的一對一的關係。

進一步的說，族群同化和族群動員並非一體的兩面，而是兩個意義不盡相同的概念。就其內涵來說，族群同化涉及到族群在互動的過程中，所產生的一種和其他族群有關的族群內部特質；而族群動員則是互動的族群之間，一種有意識的、以明顯的或內隱的方式，以其他族群為目標的政治行動的過程。就二者的關係來說，有些研究認為一個族群和其他族群的同化，可能將降低該族群動員的潛力；

但是，也有另一些研究認為族群同化是族群動員的促成因素。作者認為，這是不同的族群動員理論之間的一個重要差異⁽⁸⁾。

「反應族群論」的主要支持者 Michael Hechter 所提出的族群動員的理論中，曾指出三個影響弱勢族群動員的因素：(1)族群之間的經濟不平等程度；(2)弱勢族群之內成員互動溝通頻繁的程度；及(3)族群之間文化差異的可辨認程度 (Hechter 1975:43)。三個因素都是影響族群動員的正面因素。如果用上述族群同化的語彙來說的話，則這個理論認為如果族群之間結構同化（包括次級關係及初級關係）及文化同化程度較低，將有利於弱勢族群的族群動員。易言之，弱勢族群和優勢族群的社會區隔及文化差異，是使弱勢族群能夠較有效地進行族群動員的社會條件。反之，族群間在結構上及文化上的同化，將因為造成上述的隔離之瓦解，導致不同族群間的互動，而降低族群動員的可能性。

族群動員的「競爭論」者，對於族群同化在族群動員中所扮演的角色則有不同的看法。競爭論者以為，如果族群之間在結構上完全分隔，沒有次級關係的接觸（也就是結構同化），則不會有族群動員。當族群之間開始競爭相同的資源，也就是有某種程度的次級結構同化發生時，族群才可能以族群動員的方式，來維持或取得競爭中的優勢。在這種狀況下，族群動員是競爭中的一種策略選擇 (Bell 1975)。多數的競爭論者雖然很少直接討論除了結構同化以外，其他面向的族群同化在族群動員中所扮演的角色，但是他們的理論都暗示某種程度的文化同化和族群動員有相當關聯。Portes (1984) 將上述兩個鉅視層次的族群動員理論轉化為微視（個人）層次的理論，來解釋移入邁阿密的古巴人之間的族群覺知時，對這個問題提出了一個較清楚的界定。Portes 指出，競爭論假設文化同化有利於個人族群覺知的滋生；相反的，反應族群論 (Portes 稱之為「隔離論」[enclosure model]) 則假設文化同化不利於個人的族群覺知的發展。在這一點上，競爭論認為族群間的接觸，特別是帶有歧視意味的不平等的族群接觸的經驗，是使得弱勢族群較可能進行族群動員、或有較強的族群意識的重要原因。

(8) 當然，這兩個理論尚有許多其他的差異，例如，Mason (1992) 就指出，這兩個理論適用於描述不同類型的社會中的族群動員：反應族群論主要是針對社會中族群關係屬於有等級排列的體系 (ranked system) 的族群動員；而競爭論比較是針對非等級排列的體系 (unranked system) 中的族群動員。

五、本省籍民衆的政黨支持——族群動員的分析

如果我們將上述對族群動員的理論的討論帶入本文所分析的現象中，則對於上述本省人爲何支持國民黨及支持反對運動的問題，就有一個分析的切入點。下面，本文將以行政院國家科學委員會所資助，中央研究院民族學研究所主持的1992年12月「台灣地區社會變遷基本調查」第二期第三次調查計劃（計劃編號：NSC 81-0301-H-001-504-B1）所搜集的全島性資料，來分析本省人之間族群融合和政治支持之間的關係。關於該次調查的抽樣及整體問卷設計，請參見瞿海源（1992）。

1. 政黨支持的測量

在本文的經驗分析中，將以本省受訪者支持民進黨作爲族群動員的測量。前面對於反對運動中族群色彩的分析所得到的一個看法是：反對運動是以散佈台灣意識對抗執政的國民黨的中國意識，而企圖改變目前的權力結構。而其中相當重要的一個面向，正是過去由動員戡亂體制所創造的不平等的族群政治結構。爲了驗證這樣的看法，除了對民進黨的支持外，下文也將分析本省受訪者對於國民黨的支持。本文所以採用政黨支持作爲測量，而不用投票行爲，主要是因爲影響個人投票行爲的因素中，除了政黨支持外，尚有許多其他的因素，例如派系、親戚、或朋友的請託，也就是「選人不選黨」的因素（朱雲漢 1993）。而本文所討論的意識形態的對抗，比較能用受訪者對於政黨的整體支持的態度來掌握。在1992年的社會變遷調查中，對於受訪者政治支持是以下列的問題加以測量：「我們社會上有些人支持國民黨，有些人支持民進黨，也有些人都不支持，請問您對他們的支持程度？」。受訪者可以就國民黨及民進黨二者分別表示其支持程度（很支持、支持、不支持、很不支持、及無意見）。除了原住民外，該次調查中對於政黨支持的測量結果按族群背景區分的狀況，如表2所示。

表2中關於外省人的政黨支持的情形大致上符合前面的敘述。外省籍的受訪者有四分之三左右表示支持國民黨，也有類似的比例表示不支持民進黨（合併了「支持」及「很支持」兩個選項）。表示支持民進黨者只有7%左右，而實際投票給

表 2 不同族群背景民衆政黨支持的狀況

	國民黨			民進黨			小計
	支持	不支持	無意見	支持	不支持	無意見	
閩南人	501 (49.5)	177 (17.5)	334 (33.0)	299 (29.6)	359 (35.5)	354 (34.9)	1012 [73.0]
客家人	114 (55.3)	28 (13.6)	64 (31.1)	44 (21.3)	98 (47.6)	64 (31.1)	206 [14.9]
外省人	124 (73.4)	20 (11.8)	25 (14.8)	12 (7.1)	129 (76.3)	28 (16.6)	169 [12.1]
	739 (53.3)	225 (16.2)	423 (30.5)	355 (25.6)	586 (42.2)	444 (32.2)	1387 (100.0)

表 註：(1) Chi-Squares=35.336; DF=4; $p<.0000$ 。

(2) Chi-Squares=104.003; DF=4; $p<.0000$ 。

資料來源：「台灣地區社會變遷基本調查」二期三次，1992年12月，中央研究院民族學研究所。

民進黨的外省人比例更低。同樣的，外省籍中表示不支持國民黨者也僅 12% 左右。其政黨支持態度和本省籍的閩南人及客家人有很明顯的差異。由於外省人之間的政黨支持態度同質性相當高，而且影響其政黨支持的因素和本省人也有很大的差異⁽⁹⁾，限於本文的目的，下面的分析將只針對本省受訪者。由表 2 也可知，在本省人中，表示支持國民黨者約為 50% 強，表示不支持者約為 16% 左右；表示支持民進黨者約為四分之一，不支持者則在四成左右。各有三成左右的本省受訪者在兩黨的支持上表示無意見。

然而受訪者對於國民黨或民進黨的政黨支持並非互斥性的；在這種狀況下，表示只支持一個政黨的人對於該黨的支持程度，應高於同時也表示支持另一黨者。因此，我們可以用上述的兩個政黨的支持之測量建構出一個新的政黨支持的測量。表 3 即是將本省籍的受訪者對於國民黨及民進黨的支持程度分為「支持」（包括

(9) 見徐永明及范雲 (1994) 對外省人政治態度的分析。

「很支持」) 及「不支持」(包括「很不支持」及「無意見」) 後交叉的結果⁽¹⁰⁾。由表 3 可知, 本省受訪者中, 對於兩黨都不支持者最多, 佔 35.9%, 其次是只支持國民黨者, 佔 35.4%, 再其次是對於兩黨都支持者佔 22.9%, 比例最低的是表示只支持民進黨的 5.8%。就支持國民黨的程度而言, 上述四類人由強到弱的順序是: 只支持國民黨者、都支持者、都不支持者、只支持民進黨者。反之, 就支持民進黨的程度而言, 其順序是: 只支持民進黨者、都支持者、都不支持者、只支持國民黨者。本文將以這個測量作為政黨支持的指標。

表 3 本省受訪者中對國民黨與民進黨支持程度的交叉狀況

單位: 人

	支持國民黨	不支持國民黨	合計
支持 民進黨	216 (79.0) [39.3] {22.9}	55 (20.3) [14.0] {5.8}	271 [28.8]
不支持 民進黨	333 (49.6) [60.7] {35.4}	338 (50.4) [86.0] {35.9}	671 [71.2]
合計	549 (58.3)	393 (41.7)	942 (100.0)

表 註: 括弧()內為橫行百分比; []內為直列百分比; { }內為總百分比。

資料來源: 「台灣地區社會變遷基本調查」二期三次, 1992年12月, 中央研究院民族學研究所。

(10) 本文在測量上將政黨支持中的無意見歸入不支持, 主要是出於理論上的考量, 也就是由積極面來界定政黨支持。作者也曾將無意見另分一類再作同樣的交叉分類, 結果發現除了表示支持國民黨及對民進黨無意見一類(佔全部樣本的 7.1%) 外, 其餘的對一黨表示無意見、而對另一黨表示支持或不支持者都不到十人(都不到 1.1%)。因此, 將「無意見」與「不支持」合併在經驗分析上應是可行的。比較值得注意的是, 合併後兩黨都不支持的 35.9% (見表 3) 的樣本中, 合併前就都不支持者是 7.0%, 而對兩黨都沒有意見者, 佔 27.3%。當然這兩類人的確有差別, 例如前者的教育程度就明顯的高於後者。不過, 就本文的分析目的而言, 積極的政黨支持是比較重要的, 因此在分析中將不區分這兩類人。

2. 族群同化與政黨支持

根據上面對族群動員理論的討論，我們大致論結出兩種關於族群同化及族群動員的不同假設：隔離論認為族群同化程度較低的本省人，較可能受到族群動員的影響而支持反對運動；同化程度較高者，較可能支持國民黨。相反的，競爭論則認為，同化程度較高的本省人較可能因為感受到族群之間的競爭，較可能被族群動員而支持反對運動。表 4 的下半部列出了幾項本省人之間族群同化的面向（認同、語言、通婚）和政黨支持之間的交叉分析的結果。

表 4 本省籍的受訪者中各項自變數和四類型政黨支持的交叉表

單位：個人

政黨支持	只支持國民黨	都支持	都不支持	只支持民進黨	合計	顯著性測試
性別						
男	166 (36.0)	125 (27.1)	137 (29.7)	33 (7.2)	461 [51.2]	Chi-Squares = 12.877 DF = 3 p < .01
女	159 (36.1)	89 (20.2)	172 (39.1)	20 (4.5)	440 [48.8]	
教育						
小學	131 (29.8)	108 (24.6)	176 (40.1)	24 (5.5)	439 [48.7]	Chi-Squares = 31.612 DF = 9 p < .001
中學	52 (35.0)	40 (27.5)	53 (30.0)	9 (7.5)	154 [17.1]	
高中	28 (35.0)	22 (27.5)	24 (30.0)	6 (7.5)	80 [8.9]	
大專	114 (50.0)	44 (19.3)	56 (24.6)	14 (6.1)	228 [25.3]	
世代*						
第一代	167 (36.8)	116 (25.6)	147 (32.4)	24 (5.3)	454 [50.4]	Chi-Squares = 2.909 DF = 3 p = .406
第二代	158 (35.3)	98 (21.9)	162 (36.2)	29 (6.5)	447 [49.8]	
任職						
公部門	37 (43.0)	20 (23.3)	20 (23.3)	9 (10.5)	86 [9.5]	Chi-Squares = 8.057 DF = 3 p < .05
私部門	288 (35.3)	194 (23.8)	289 (35.5)	44 (5.4)	815 [90.5]	

認同

台灣人	55 (20.5)	63 (23.5)	119 (44.4)	31 (11.6)	268 [29.7]	Chi-Squares = 70.407
台一中	118 (37.6)	88 (28.0)	96 (30.6)	12 (3.8)	314 [34.9]	DF=9 p<.0000
中一台	66 (44.6)	31 (20.9)	43 (29.1)	8 (5.4)	148 [16.4]	
中國人	86 (50.3)	32 (18.7)	51 (29.8)	2 (1.2)	171 [19.0]	
婚姻類型						
省籍通婚	41 (63.1)	8 (12.3)	16 (24.6)	0 (0.0)	65 [7.2]	Chi-Squares = 24.061
內婚	284 (34.0)	206 (24.6)	293 (35.0)	53 (6.3)	836 [92.8]	DF=3 p<.0001
合計	325 (36.1)	214 (23.8)	309 (34.3)	53 (5.9)	901 [100.0]	

國語流利程度

	(1)	(2)	(3)	(4)	
平均數	6.10	5.25	4.21	4.71	5.17
標準差	2.83	3.17	3.08	3.26	3.12

ANOVA 的 Scheffe test 顯示(1)-(2), (1)-(3), (1)-(4)及(2)-(3)達到.05 的統計顯著差異。

表註：(1)* 世代是以受訪者年齡區分，「第一代」是指受訪時四十一歲以上者，「第二代」是指二十歲到四十歲者。

(2)括弧()中為橫行百分比，[]為直列百分比。

(3)任職公部門包括在政府機關或學校，及在公營事業工作者。

(4)認同是以下面的題目測量的：「下面有好幾種對自己的稱呼，請問您覺得那一項最對您最適合？」，答案則包括：「我是台灣人」、「我是中國人」、「我是中國人也是台灣人」、「我是台灣人也是中國人」、「其他」。

(5)省籍通婚是指受訪者配偶為外省人者，否則為內婚。

(6)國語流利程度是讓受訪者自己判定，0 代表完全不懂，10 表示很流利。

資料來源：「台灣地區社會變遷基本調查」二期三次，1992 年 12 月，中央研究院民族學研究所。

首先，在「認同同化」方面，本文所使用的測量，是最初由張茂桂和蕭新煌(1987)所設計的題目，其詳細的問項請見表 4 下面附註中的說明。它是以受訪者認同自己是中國人的強度，來測量本省人認同同化的程度。因此，認為自己是中國人是最強的認同同化，而認為自己是台灣人者則為認同同化最低者。介於兩極中間的，則是回答其他及兩種認同都有者。根據這個測量分析的結果，認同同化

的程度和本省人支持國民黨有強烈的正向關聯，而和支持民進黨有負向關聯。其中只支持國民黨的比例最高者是自認為自己是中國人者 (50%)，其次是自認「我是中國人也是台灣人」(45%)、「我是台灣人也是中國人」(38%)，而最低者則是自認為自己是「台灣人」者，只有 21% 左右支持國民黨。而只支持民進黨者的認同，則幾乎依完全相反的順序排列，其中自認為自己是台灣人者最高，有 12% 左右表示只支持民進黨，而自認為是中國人者最低，僅 1.2% 左右只支持民進黨。相對的來說，對兩黨表示都支持或都不支持者，是比較傾向於混合的認同或台灣認同。總體來說，本省人之間認同同化和其政黨支持有極為顯著的關係。

值得注意的是，雖然自認自己是中國人、中國人也是台灣人、或台灣人也是中國人者都有最高比例只支持國民黨；但是自認自己是台灣人者政黨支持最高的比例是兩黨都不支持 (44%)，其中只支持國民黨的比例 (21%) 甚至幾乎是只支持民進黨者的兩倍 (12%)。因此，雖然只支持民進黨的受訪者中絕大多數是有強烈的台灣認同者，但是有強烈的台灣認同者大多數都不支持民進黨。換言之，台灣認同似乎只是支持民進黨的必要條件，而非充分條件。下文將再針對此討論。

本省人中「語言同化」的指標與政黨支持之間也有類似的關係。本文以使用國語流利的程度來測量本省人之中語言同化的程度。在社會變遷的調查中，是以受訪者對於自己國語流利的程度來測量：「對於語言方面，如果說 0 分代表完全不懂，10 分代表很流利，請問您的國語大約是幾分？」社會變遷的資料顯示，本省人中只支持國民黨者國語平均而言顯著的比其他組流利，次流利的是兩黨都支持者，其次是只支持民進黨者，國語最不流利的是兩黨都不支持者。如果排除國語最不流利的政治冷漠者(兩黨都不支持者)，則語言同化的程度和對國民黨的支持呈現正相關，和對於民進黨的支持呈現負相關。

「族群通婚」對於本省人的政治支持態度也有類似的影響：配偶為外省籍的本省人，有 63% 只支持國民黨，而配偶同是本省人者，只有 34% 只支持國民黨。反過來說，通婚的本省人很少只支持民進黨；在 1992 年 12 月的社會變遷調查受訪者中，沒有表示只支持民進黨的省籍通婚的本省受訪個案。所有的只支持民進黨的本省受訪者配偶都同是本省人。省籍的族群通婚和政黨支持之間的關係十分顯著。

上述三個本省人族群同化的指標（認同、國語流利的程度、及通婚）對於本

省人政黨支持的影響都達到 .01 以上的統計顯著水準。而它們共同表現出來的模式則是：族群同化程度愈高者，愈支持國民黨；而民進黨的支持者則以族群同化程度較低者比例較高。按本文前面對於民進黨族群動員的特性之討論，則初步的資料分析似乎比較支持反應族群論（即隔離論）對於台灣反對運動中，本省人族群動員的解釋。

3. 族群同化的原因與政黨支持

作者在另一篇論文中曾經指出，國民黨對於本省人的族群同化政策主要的目的，是想將本省人教化成爲接受中國認同、及說國語的中國人（王甫昌 1993）。上面的分析說明了這些族群同化的成果的確有助於支持國民黨政權的合法性。然而，上述論述成立的一個關鍵在於：這些族群同化的成果，是否確實是由「體制性」的同化力量所促成？而不是一個自然融合過程的結果？回答這個問題的一個方法，是進一步檢驗不同的族群同化的促因（包括體制性及非體制性）、族群同化、和民眾政治支持三者之間的關係。如果族群同化對於民眾政治支持的影響主要是來自於體制性的同化力量，則我們應可預期體制性的族群同化促因對於本省人的政黨支持（特別是對於國民黨的支持）有促進的作用。

根據作者用一份由遠見雜誌社在 1987 年（民進黨剛成立時）所做的省籍問題調查資料，重新分析的結果顯示，促使本省人接受「中國人」的認同（認同的同化）、與家人交談時使用國語（語言或文化的認同）的主要因素，是其暴露在政府所能控制的教化機制中的時間之長短（Wang 1989，第三章）。具體的說，個人的教育程度及所屬的世代，是分辨本省人在文化及認同的同化程度上，相當有解釋力的兩個社會背景因素。另外，作者最近的一篇論文（王甫昌 1994）也發現族群接觸的機會對於族群通婚有顯著的促進作用。此外，由於第一代移入的外省人之間男性是女性的三倍，本省女性因此比本省男性更有機會和外省人通婚。根據這些過去的經驗發現，本文採用了四個影響同化的因素來分析它們和本省人的政黨支持之間的關係：性別、世代、教育、及是否任職於公部門。在這四項族群同化的促因中，教育及是否任職於公部門是比較屬於體制性的同化力量，而世代及性別是比較屬於非體制性的同化力量（王甫昌 1993）。這些分析的結果列於表 4 的上半部。

就性別而言，本省籍的受訪者之間，男女在只支持國民黨的部分幾乎是完全一樣的，但是女性在支持民進黨的部分卻遠低於男性，都不支持的部分則高於男性。以上的差異達到 .01 的統計顯著水準。

就教育程度與對國民黨的支持來說，本省人之中擁有大專以上教育的受訪者，表示只支持國民黨的比例高達 50% 左右，教育程度愈低則支持的比例愈低，小學教育程度的本省人表示只支持國民黨的只有 30% 左右。不過，教育程度和只支持民進黨的關係就沒有那麼明顯，其中以小學及大專以上教育程度者支持較低，約為 6% 左右支持，而以中學及高中教育者支持的比較高，各為 7.5%。如果教育代表了受訪者受到體制性同化力量影響的多寡，則顯而易見的，受這種力量影響的程度和支持國民黨是有明顯的關聯。值得注意的是，教育程度同時也和是否具有較明確的政黨支持立場有正相關；因此，如果扣除掉表示都不支持的人（政黨支持立場不清楚者），則教育程度較低的本省人之間表示支持民進黨的比例將更高。

如果教育代表一個較強勢、較有組織的同化力量，則世代測量的，是一個較弱、非體制性的同化力量。第一代本省人（目前四十歲以上的受訪者）因為大多數都有被日本殖民統治的經驗，也在光復後經歷過二二八事件，因此接受中國意識對他們而言，是一個意識轉化（再社會化）的過程；第二代（目前二十至四十歲者）接受中國意識，則是一種初級社會化的過程。不過，與本研究的預期較不符合的是，資料顯示本省第二代和第一代在政黨支持上，並沒有明顯的差異。世代的變數因此將不納入下面的分析。

最後，任職於公家機關的本省人只支持國民黨的比例，遠較任職於私人機構者高；不過，任職公部門者支持民進黨的比例，也明顯地比任職私人部門者為高。這可能和任職公部門者教育程度較高，比較有明確的政黨支持立場有關；任職私人部門者的確有最高的比例是兩黨都不支持。

由上面四項促進同化的因素和受訪者政黨支持的關係來看，則可以說族群同化明顯地增加本省人支持國民黨的程度，支持民進黨的部分則比較沒有明顯的模式。

4. 族群同化的原因、族群同化、及政黨支持

爲了凸顯上述族群同化的變數對於本省民眾政黨支持的影響，本文在分析的

最後將前面提到的三個族群同化的指標(認同、國語流利程度、及是否通婚)，再加上三個用以測量有助於族群同化的因素(性別、教育、及是否任職公部門)，同時放入 Logistic Regression 的模式，去預測本省民眾對國民黨及對民進黨的不同的支持程度。這項分析的結果列於表 5 中。

表 5 中共列出了四個迴歸分析的結果，其中第一行是以只支持國民黨者為 1，其餘為 0 作為依變數。第二行是以支持國民黨（包括只支持國民黨者及兩黨都支持者）為 1，其餘為 0 作為依變數。類似的分類方式也用於界定所謂的「支持民進黨」（第三行）及「只支持民進黨」（第四行）兩個依變數。

上述六項因素個別和政黨支持都有達到統計顯著的相關，當它們同時放入同一的模式去預測本省人是否支持國民黨時，相互控制的結果使我們更能評估族群同化對於民眾政黨支持的真正影響。表 5 中最值得注意的是，原本有高度影響的教育程度，在控制了幾項族群同化的指標後，就變得不顯著了。同樣的，原本任職公部門對於只支持國民黨的影響，也被省籍同化的指標解釋掉了。這說明了教育及任職公部門對於本省籍民眾強力支持國民黨的影響，其實主要是透過族群同化而產生的。也就是說，教育及任職公部門對於本省民眾支持國民黨並沒有直接或獨立於族群同化之外的影響。另外，在三個族群同化促因的變項中，只有性別在加入族群同化的指標後，仍然維持其對於支持國民黨及（第二行）支持民進黨（第三行）的顯著影響。其中女性比男性更支持國民黨，顯著的更不支持民進黨。這也說明了本省人的族群同化是比較受到體制性的同化力量（教育或任職於公部門）的影響。

在控制了上述的同化的促進因素後，三項省籍同化的指標對於本省人對國民黨的支持仍有明顯的影響。由第一行及第二行的分析結果可知本省人之中認同自己是中國人、國語流利、及配偶是外省人者，都顯著地比較支持國民黨，而認同自己是台灣人者則是顯著地較不支持國民黨。如果比較第一行及第二行的分析結果（二者的差別是前者只支持國民黨，而後者不但支持國民黨也支持民進黨），則可以發現本省人族群同化的指標更能有效的解釋「只」支持國民黨（而不支持民進黨）者與其他人的差別。

反之，最能解釋本省人之間支持民進黨的變數，是本省人的台灣人認同。在表 5 的第三行中，決定本省人中「支持民進黨」或不支持民進黨最重要的影響因

表 5 本省籍的受訪者中各類政黨支持對各項自變數的 Logistic 迴歸係數

自變數	(1)	(2)	(3)	(4)
	只支持 國民黨	支持 國民黨	支持 民進黨	只支持 民進黨
族群同化之測量				
認同 台灣人	-.681*** (.137)	-.525*** (.121)	.385** (.130)	1.171*** (.271)
中國人	.395** (.138)	.183 (.144)	-.472** (.163)	-1.296* (.553)
台一中	.024 (.114)	.215+ (.114)	.197+ (.120)	-.102 (.304)
國語流利程度	.115*** (.031)	.149*** (.030)	.038 (.031)	-.051 (.061)
省籍通婚	.458** (.142)	.280+ (.155)	-.482* (.197)	-3.054 (5.89)
族群同化原因的測量				
性別 (男=1)	-.043 (.076)	-.135+ (.074)	.250** (.078)	.207 (.154)
教育 小學	-.120 (.140)	-.228+ (.137)	.021 (.143)	.466 (.290)
中學	.115 (.152)	.066 (.148)	.061 (.154)	.024 (.302)
高中	.332 (.198)	.200 (.192)	.264 (.196)	-.448 (.360)
任職公部門	.073 (.131)	.084 (.134)	.107 (.135)	-.323 (.232)
(常數)	-.916*** (.276)	-.236 (.274)	-1.474*** (.306)	-5.504 (5.903)
Model				
Chi-Squares	94.62	79.18	39.91	40.96
自由度	10	10	10	10
N	901	901	901	901
pseudo R Squares	.0950	.0807	.0424	.0435

表註：(1)資料來源及變數測量方式同表 4。

(2)+ $p < .10$, * $p < .05$, ** $p < .01$, *** $p < .001$ 。

(3)認同中的「中國人——台灣人」及教育中的「大專以上」是對照組。

(4) pseudo R Squares 的計算是採用 Aldrich and Nelson (1984:57) 所建議的公式, pseudo R Squares = $C / (C + N)$, 其中 C 是分析模式的 Chi-Squares, 而 N 是樣本數。

素依序是男性、「台灣人」的認同、配偶為本省人、「台灣人也是中國人」的認同。在第四行「只支持民進黨者」與其他人的分析中，則只有「台灣人」的認同有正面的影響、而「中國人」的認同有負面的影響。因此，相對而言，上述本省人族群同化的指標，除了台灣人的認同外，對於本省人支持民進黨的解釋力就比較有限。國語流利與否根本沒有影響，是否族群通婚也只能區辨同時也支持國民黨的民進黨支持者與其他人的差別，而不能區辨只支持民進黨者與其他人的差別。

以上的分析結果大致上支持了本文對於反對運動以「台灣意識」對抗國民黨的「中國意識」的族群動員詮釋。具體的說，本省人之中認同自己是台灣人者較支持民進黨、較不支持國民黨；認同自己是中國人者的政黨支持剛好相反，不過其區辨力強度不及台灣人認同高。「台灣人」對「中國人」的認同可以說是民進黨及國民黨支持者最鮮明的差別。不過，除了認同的同化以外，本省人在語言上的同化（國語流利的程度）及省籍通婚也對於其支持國民黨有獨立的影響。同化程度較高的本省人群體明顯的比較支持國民黨。相反的，通婚對於本省受訪者是否支持民進黨則有負面的影響。

上述本省人在認同及語言上的同化，可以說是國民黨教化政策的直接結果，而族群通婚的社會（結構）性同化則是這些政策間接或非意圖性促成的結果。這些由體制性的力量直接或間接促成的族群同化，使得為數相當多的本省人即使在提倡台灣人意識的民進黨出現後，仍然較支持國民黨。相對的，台灣人意識則和教育沒有明顯的關係；台灣人意識顯然並不是教育程度較低的本省人的獨有特質。這也可以由表 5 中兩個解釋支持國民黨的迴歸模式（第一、二行）解釋的變異量（其 pseudo R Square 分別是 9.50% 及 8.07%），高於兩個解釋支持民進黨的迴歸模式（第三、四行）的解釋變異量（4.24% 及 4.35%）看出。在反對運動缺乏體制性的力量作為意識傳播的機制之狀況下，本省人的台灣意識和教育程度（體制性的教化力量）沒有關係原在意料之中。這也說明了本省人的台灣意識並不是中國意識教化不完全或不成功的殘餘物，否則台灣意識應和教育程度有負向的關係，而不是沒有關係。

總括的說，本省人的族群同化似乎降低了他們被反對運動族群動員的可能性。相對的來說，族群同化程度較低的本省人比較支持民進黨，也就是隔離論的預設比較符合本省籍民眾之間受到反對運動族群動員的模式。

六、結 論

本文主要的目的，在於為台灣反對運動和族群議題的糾結提出一個初步的解釋。本文指出，作為一個追求台灣地區政治民主化的在野政治力量，反對運動中的族群色彩可以說是台灣地區所存在的族群政治結構下的，很難避免的現象。在 1991 年國會全面改選之前，反對運動所挑戰的政治權力結構，是國民政府自大陸撤退後，在台灣所建立起來的一個威權統治結構。這個政治權力結構基於其自外移入的歷史性格，在權力的安排上有極為濃厚的族群色彩。我們幾乎可以說，族群是台灣在一九五〇年代以後台灣政治權力結構中最重要的組織原則。在這樣的族群政治結構下，族群動員成為一個追求政治民主化的反對運動最有效的發展策略。本文的第一部分在分析了台灣反對運動的目標（民主化及本土化）、用以動員的手段（台灣意識或台灣人的民族主義）、及領導層與一般支持者的族群組成後，指出台灣反對運動的發展在本質上是一個族群動員的過程。

然而，為何多數反對運動的領導層都否認其族群的色彩？針對此，本文進一步指出，一個社會的族群政治的結構不但影響了政治反對力量挑戰的目標，也限定了可以採用的動員策略。就台灣的狀況來說，省籍族群在政治權力分配上的不平等固然使族群動員成為較有效的挑戰策略，但是台灣的省籍族群在地理分布上沒有明顯的區隔，以及過去四十年之中在初級及次級層面的互動，雖然並未使族群之間達到完全融合，但是至少使得多數的人都認為族群同化是自然、可欲的社會發展；也達成了相當程度的文化、婚姻、甚至一些結構上的同化。在這種狀況下，以明顯的族群訴求作為政治動員的口號是較不受歡迎的。台灣反對運動的族群動員策略是本文所說的內隱式的，也就是透過政治的民主化的要求及來改變現有的族群政治結構。

更重要的是，反對運動的族群動員造成絕大多數的外省人即使對國民黨一黨獨大所導致的弊病不滿，也不願意支持民進黨。到 1992 年為止，外省人在投票支持民進黨的比率仍不到 10%，民進黨的支持者 95% 以上都是本省人。因此，本文認為解釋台灣反對運動支持的問題可以簡化為：「為何本省人支持國民黨？為何本省人支持民進黨？」。本文接著由族群同化與族群動員二者之間關聯的分析觀點，

去重新界定本省籍的民眾政黨支持的問題；反對運動對於現有體制的挑戰中一個主要的著力點，正是在於反對運動以台灣意識去挑戰國民黨的中國意識。而形塑本省人的中國意識可以說是國民黨政權對於本省人族群同化政策的主要目的。它是現有政權取得或保有合法統治地位的關鍵之一。因此，台灣的族群同化對於台灣政治的發展扮演著舉足輕重的角色。

本文以社會變遷調查 1992 年 12 月的調查資料，去分析本省籍民眾之間族群同化的程度與其政黨支持之間的關係發現，族群同化程度較高的本省人，也就是在認同（自認是中國人）、文化（國語流利）、及婚姻（省籍通婚）三方面，比較支持國民黨。這個發現支持了本文對於省籍族群同化的體制支持功能的論述。這三個族群同化的變項更有效地將體制性的同化力量（教育及任職公部門）對於本省籍民眾支持國民黨的影響解釋掉了。顯示教育程度對於本省籍民眾支持國民黨的正面影響，主要因為它成功地在認同上及語言上同化了本省人接受中國人認同及國語。反過來說，台灣人的認同對於本省籍民眾支持民進黨有相當顯著的正面影響，而中國人認同則有負面的影響。這個發現為本文所提出的反對運動具有族群動員特性、及反對運動以台灣意識對抗中國意識的說法提供了有利的佐證。

不過，必須指出的是，認同自己是台灣人的本省人中，表示兩黨都不支持、或是支持國民黨者，其比例都高於表示支持民進黨者。這說明了台灣人的認同充其量只是本省人支持民進黨的必要條件，而非充分條件。這或許和 1991 年國會全面改選後，國民黨權力結構的逐漸本土化，原本外省人擁有絕對政治優勢的族群政治不平等的狀況有明顯改善有關。國民黨透過本土化祛除其被批評為外來政權的歷史包袱，因而有效的瓦解了過去反對運動最有利、也是最容易引起本省人共鳴的挑戰議題——隱藏在動員戡亂體制背後的省籍族群政治的不平等。另外，雖然國民黨仍然堅持中國的認同，但是在面對台灣意識逐漸高漲的壓力下，部分的接納或整合台灣意識似乎是不可避免的趨勢。這可以由國民黨當中堅持大中國意識的新連線成員，在 1993 年終於正式脫黨成立新黨見其一端。在這種狀況下，台灣意識不再是反對運動或民進黨的專利。因此，雖然民進黨及其前身的黨外一直以提倡台灣意識來對抗國民黨的中國意識，然而反對運動階段性目標——國會全面改選——的達成，卻模糊了國民黨與民進黨過去在中國意識及台灣意識的對立上，截然分明的立場。國民黨在國會全面改選之後，仍然維持絕對優勢的地位，

使得它可以合法的宣稱自己的本土性及民主的基礎。這多少削弱了反對運動台灣意識訴求的政黨支持區辨力。本文分析的資料顯示，本省人的台灣人認同和支持國民黨似乎不是（或不再是）相互牴觸的態度。

對於兩個西方的族群動員理論（競爭論及隔離論），本文的經驗發現所能提供的檢討比較有限。如果我們以支持民進黨作為本省人族群動員的測量來觀察的話，則可以發現族群同化程度比較低的本省人有較高程度的族群動員。由於外省人佔台灣的人口比例只有 14% 左右，而且大量集中在北部地區，作者過去的研究顯示本省人族群同化程度較高者，和外省人有較多接觸機會（Wang 1989；王甫昌 1994）。這些結果似乎意味著在族群互動上比較處於隔離狀態、較沒有機會接觸外省人的本省人比較容易被族群動員起來。按本文前面的討論，這比較符合族群動員「隔離論」的說法。在台灣的省籍同化（融合）本質上屬於單向的教化（王甫昌 1993）的狀況下，本省人之間族群同化較低者較易受到族群動員的影響之發現並不意外。不過，本文對於競爭論及隔離論的族群動員的解釋之檢驗，是以一次橫斷面、微視層次的資料進行而得。在沒有用不同時間下的橫斷面的資料及鉅視層次的資料也做驗證、及對族群動員的過程作更詳細的分析之前，我們無法就此論斷二者對台灣族群動員狀況的解釋孰優孰劣。

無論如何，本文所提出的台灣族群政治論述，及初步的經驗資料分析結果都顯示此一分析觀點在瞭解台灣政治現象上所具有的潛力。不過，本文的資料及論述雖然都明確的說明了本省籍民眾的中國意識，是執政當局體制性教化的結果，而且有助於維持現有政權的合法性；但是，對於影響本省籍民眾支持民進黨的台灣意識，其來源如何我們的瞭解仍然有限。未來的研究可以發展的一個方向，是更細緻的解釋台灣意識的來源，及台灣意識與反對運動和台灣族群關係之間的關聯。更重要的是，隨著 1991 年國會的全面改選，過去外省族群政治優勢的逆轉，台灣的族群政治似乎進入一個新的階段。新形式的族群動員是否應運而生，是一個在理論上及實務上都值得注意及觀察的現象。

參考書目

王甫昌

- 1990 族群動員與台灣反對運動的支持轉移——由一九八九年立委選舉結果談起，中國論壇 360:42-52。
- 1993 省籍融合的本質——一個理論與經驗的探討，收錄於張茂桂主編，族群關係與國家認同，頁53-100。台北：業強出版社。
- 1994a 光復後台灣漢人族群通婚的原因及形式初探，中央研究院民族學研究所集刊 76:43-96。
- 1994b 族群通婚的後果：省籍通婚對於族群同化的影響，人文及社會科學集刊 6(1):231-267。

王振寰

- 1989 台灣的政治轉型與反對運動，台灣社會研究季刊 2(1):71-116。

中國論壇

- 1987 「中國結」與「台灣結」研討會論文集，中國論壇 289期。

石計生等

- 1993 意識形態與台灣教科書——我國中小學人文社會學科之研究。台北：前衛出版社。

朱雲漢

- 1993 選民的政黨選擇，「選舉行為、憲政秩序與政治變遷」學術研討會論文，國立台灣大學政治學研究所選舉行為研究小組主辦，1993年12月17日。

若林正文

- 1989 轉型期的台灣——「脫內戰化」的政治。台北：故鄉出版社。

林佳龍

- 1989 威權侍從政體下的台灣反對運動——民進黨社會基礎的政治解釋，台灣社會研究季刊 2(1):117-143。

吳乃德

- 1993a 國家認同與政黨支持：台灣政黨競爭的社會基礎，中央研究院民族學研究所集刊 74:33-61。
- 1993b 省籍意識、政治支持和國家認同——台灣族群政治理論的初探，收錄於張茂桂主編，族群關係與國家認同，頁27-51。台北：業強出版社。

徐永明、范雲

- 1994 台灣政治轉型過程中的省籍政治——外省人的危機意識及其政治表現，「“外省人”在台灣」研討會論文，“外省人”台灣獨立協進會主辦，1994年1月9日。

黃光國

- 1987 「台灣結」與「中國結」：對抗與出路，中國論壇 289:1-19。

施敏輝 編

- 1988 台灣意識論戰選集——台灣結與中國結的總決算。台北：前衛出版社。

陳伯璋

- 1988 意識形態與教育。台北：師大書苑。

陳樹鴻

- 1983 台灣意識——黨外民主運動的基石，生根，七月號。

張茂桂

- 1993 省籍問題與民族主義，收錄於張茂桂主編，族群關係與國家認同，頁233-278。台北：業

強出版社。

張茂桂、蕭新煌

1987 大學生的中國結與台灣結——自我認定與通婚觀念的分析, 中國論壇 289:34-53。

劉一德

1991 西線無戰事——外省人的政治參與, 收錄於林濁水編著, 瓦解的帝國 (族群篇), 頁127-148。台北: 前衛出版社。

Aldrich, John H. and Forrest D. Nelson

1984 *Linear Probability, Logit, and Probit Model*. Sage University Series on Quantitative Applications in the Social Sciences, Newbury Park, Ca.: Sage Publications

Barth, Fredrik

1969 Introduction. In *Ethnic Groups and Boundaries: The Social Organization of Cultural Difference*. Fredrik Barth, ed., pp.9-38. Boston: Little Brown.

Beach, Stephen W.

1977 Social Movement Radicalization: The Case of the People's Democracy in Northern Ireland. *The Sociological Quarterly* 18 (Summer):305-318.

Belanger, Sarah and Maurice Pinard

1991 Ethnic Movements and the Competition Model: Some Missing Links. *American Sociological Review* 56(4):446-457.

Bell, Daniel

1975 Ethnicity and Social Change. In *Ethnicity: Theory and Experience*. Nathan Glazer and Daniel P. Moynihan, eds., pp.141-174. Cambridg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Chang, Mau-kuei Michael

1989 The Formation of Partisan Preferences in Taiwan's Democratization Process. In *Taiwan: A Newly Industrialized State*. Hsin-huang Michael Hsiao, Wei-yuan Cheng and Hou-Sheng Chan, eds., pp.311-344. Taipei: Department of Sociology, National Taiwan University.

Emerson, Rupert

1960 Nationalism and Political Development. *Journal of Politics* 22(1):3-28.

Gellner, Ernest

1969 *Thought and Change*.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Gordon, Milton M.

1969 *Assimilation in American Life: The Role of Race, Religion, and National Origins*.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Hannan, Michael T.

1979 The Dynamics of Ethnic Boundaries in Modern States. In *National Development and the World System: Educational, Economic and Political Change, 1950-1970*. John W. Meyer and Michael T. Hannan, eds., pp.253-75. Chicago: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Hechter, Michael

1975 *Internal Colonialism: The Celtic Fringe in British National Development, 1536-1966*. Berkeley: The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Klandermans, Bert

- 1984 Mobilization and Participation: Social-Psychological Expansions of Resource Mobilization Theory. *American Sociological Review* 49 (5):583-600.

Lipset, Seymour M. and Stein Rokkan

- 1967 *Party System and Voter Alignment*. New York: The Free Press.

Mason, T. David

- 1992 Ethnicity and Politics. In *Encyclopedia of Government and Politics*, Volume I. Mary Hakesworth and Maurice Kogan, eds. London: Routledge.

McAdam, Doug

- 1982 *Political Process and the Development of Black Insurgency, 1930-1970*.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McCarthy, John D. and Mayer N. Zald

- 1977 Resource Mobilization and Social Movements: A Partial Theory. *American Sociological Review* 82(6):1212-1241.

Nielsen, Francois

- 1980 The Flemish Movement in Belgium After World War II: A Dynamic Analysis. *American Sociological Review* 45 (1):76-94.
- 1985 Toward a Theory of Ethnic Solidarity in Modern Societies. *American Sociological Review* 50 (2):133-149.

Olzak, Susan

- 1982 Ethnic Mobilization in Quebec. *Ethnic and Racial Studies* 5(3):253-275.
- 1983 Contemporary Ethnic Mobilization. *Annual Review of Sociology* 9:355-374.
- 1985 Ethnicity and Theories of Ethnic Collective Behavior. *Research in Social Movements, Conflicts and Change* 8:65-86.

Olzak, Susan and Joane Nagel (eds.)

- 1986 *Competitive Ethnic Relations*. Orlando: Academic Press, Inc.

Piven, Frances Fox and Richard A. Cloward

- 1979 *Poor People's Movements: Why they Succeed, How they Fail*. New York: Vintage Books.

Portes, Alejandro

- 1984 The Rise of Ethnicity: Determinants of Ethnic Perceptions Among Cuban Exiles in Miami. *American Sociological Review* 49(3):383-97.

Ragin, Charles

- 1979 Ethnic Political Mobilization: The Welsh Case. *American Sociological Review* 44(4): 619-635.

Ragin, Charles and Ted Davies

- 1981 Welsh Nationalism in Context. *Research in Social Movements, Conflict and Change* 4:215-233.

Smelser, Neil J.

- 1962 *Theory of Collective Behavior*. New York: The Free Press.

Smith, Anthony D.

- 1971 *Theories of Nationalism*. New York: Harper & Row Publishers.

Wang, Fu-chang

1989 *The Unexpected Resurgence: Ethnic Assimilation and Competition in Taiwan, 1945-1988*. Ph.D. dissertation. Department of Sociology, The University of Arizona

Wu, Nai-teh

1987 *The Politics of A Regime Patronage System: Mobilization and Control Within An Authoritarian Regime*, Ph.D. dissertation. Department of Political Science,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ETHNIC ASSIMILATION AND MOBILIZATION: An Analysis of Party Support in Taiwan

Wang Fu-chang

(ABSTRACT)

This is a preliminary study of what would seem to be a connection between Taiwan's political opposition movement and ethnic mobilization. I point out that, given an ethnic imbalance in Taiwan's political power structure in favor of mainlanders, an appeal to a Taiwanese sense of ethnic injustice by the political opposition movement is inevitable. Still, assimilation between mainlanders and Taiwanese and their geographic intermixing over the past four decades has limited the available options of the opposition movement to implicit appeals for ethnic mobilization. Also, the opposition movement's effectiveness in ethnic mobilization has been countered by the Kuomintang party's unilateral imposition of ethnic assimilation of the Taiwanese through that party's control of such state-run institutional forces as education and the mass media.

Data reported in the A General Survey of Social Change in Taiwan (T'ai-wan ti-ch'ü she-hui pien-ch'ien chi-pen tiao-ch'a 台灣地區社會變遷基本調查) is utilized to empirically test the above hypothesis by measuring party support between mainlanders and Taiwanese. However, since there is no significant variation among mainlanders insofar as they overwhelmingly support the Kuomintang party, analysis focuses instead on explaining which party or parties the Taiwanese support. Taiwanese with higher levels of ethnic assimilation (those who identify themselves as Chinese, those who speak fluent Mandarin, and those who have married mainlanders) tend to indicate strong support for the Kuomintang party. Taiwanese with lower levels of ethnic assimilation (those who identify themselves as Taiwanese and, though to a lesser degree, are married to Taiwanese) indicate strong support for the Democratic Progressive Party. I then go on in this essay to elaborate on the role of

the Kuomintang party's control of education and mass media to affect part support by assimilating Taiwanese ethnicity to mainlander ethnicity.